

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籍简介

钱存训

一、欧美收藏与汉学研究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语文发生兴趣，主要原因有四，即基督教义的传播、商业发展的需要、外交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鼓励。传教、通商和外交往来，虽然对语言讲通有实际上的需要，但不一定依靠大量藏书。如果只是学习语言，有几种课本就可应付。真正对中国书籍作有系统的搜求，主要是对中国文化作深入的了解，即所谓‘汉学’研究为其导因。只有研究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专题时，才需要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作为研究的基础。

最初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追求，可能出于好奇或仰慕，希望以中国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补充西方文化中的缺陷。十六、七世纪欧洲作家有关中国的著述，大都把中国描写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所理想的国家。虽然他们所叙述中国的风俗习惯以至政教制度都和西方不同，但对于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东方古国，自然要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其后，在欧洲的高等学院中，一般都设有非西方语文的学术讲座，因此中文也加入这种讲座，奠定了研究近东、印度和远东三足鼎立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之基础。

在第二次大战以前，‘汉学’（Sinology）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言、历史、哲学、宗教和制度，主要是基于研读中国经典原著，以西方治学的方法作出分析，阐述和结论。但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因为现代中国的研究进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汉学’这一名词便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虽然研究

的范围仍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换言之，‘汉学’可说是一种书本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他非书本的研究和非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不在‘汉学’的范围之内。

至于西方‘汉学’起源于何时何地，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起源于法国，一说是开始于其他国家。实际上，中国文化最早传到欧洲是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十六、七世纪来到中国的许多宣教士，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开启了对‘汉学’研究之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如意大利籍的利马窦以及其后陆续到达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他们不仅将西洋科学带到中国，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如“四书”最早于一五九三年译成拉丁文，不久就译成法文（一六一六年）、德文（一六一七年）、西班牙文（一六二一年）、意大利文（一六二二年）和英文（一六二五年）。“五经”也很早就译成拉丁文。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最后才由法国人继承，成为正统的‘汉学’研究。法兰西皇家学院在一八一四年正式开设中文和满文的特别讲座，东方语文学学院也在一八四三年设置中文会话讲座，这是西方大学把中国研究列入正式课程的开始。其后，帝俄在一八五一年，荷兰在一八五六年，英国在一八七六年，也将‘汉学’列入大学课程。其他没有设立‘汉学’课程的国家（如德国），也把学生送到法国接受训练，从此法国乃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开始。因为教会向亚洲发展以及商业往来的增加，促进了中美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欧洲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许多大学课程都仿照欧洲

的体系，因此‘汉学’也成为美国的东方研究之一支。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大学里的汉学讲座一部分由过去留华的宣教士担任，另一部分则由欧洲的汉学家或曾在欧洲接受训练的美国学者主持。一直到最近二、三十年，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才有比较独立的研究路线。语文的教学从文言兼顾到白话，研究的范围从人文扩充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古代延长到现代，这些观念和方法的改变都是从美国开始。而对非西方语文的教学和对所谓‘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提倡，乃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在西方高等教育方面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所追求的所谓现代化是西方的科技，则近年来西方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便是对于东方文化的了解，而中国文化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随着汉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美国图书馆在百年前也开始收藏中文书籍。最初读者寥寥，据称那时能阅读中文者尚不及美国联邦各洲之数目（按当时有三十八州），而今日能看能说或利用中文资料作研究者至少百倍于百年之前。目前美洲的中文图书，除中、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秘鲁等国几所重要大学各有收藏外，其余皆集中在北美。美、加两国现有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大小将近一百所，藏书总数达五百万册，其中估计有三分之一为线装古籍，大部分为二次大战前所积存。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研究中国的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洲。不仅教学的普遍和研究的风气如此，而图书设备的扩充，尤为明显。因为经费比较充裕和管理的专业化，尤其许多中国学者参与策划、采编、参考等等工作，使许多大学及研究图书馆的资源、设备与服务达到很高的水平，较之国内相等的单位有过之无不及。凡有研究价值的书刊都兼收并蓄，罕见的资料大多复制或影

印，以求完备。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禁忌，有许多文献，反而只有在国外可见其全。今天美国东亚图书馆能在世界上有其特殊的地位，这是和中国学者与专业人员的贡献分不开的。

二、欧美收藏的特色与重要性

自从十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向东方拓殖以来，通过探险家、商人、宣教士先后来到中国，开启了中西交通之门。这些人为了增进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开始搜集图书带回本国，作为教学或研究之用，或加以翻译，作为有关中国著述的参考资料。譬如十六世纪两次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宣教师马丁拉达（Martin de Rada）在他的报告中就说搜集了不少各门各类的中文书籍，如历史、地理、方志、历书、航海、礼仪、律例、医药、地质、天文、传记、游艺、音乐、数学、建筑、占星术、手相、相面、书法、卜筮以及兵书。其中有方志八种，述及有关金银的记载。这些书最初带到菲律宾，由华人协助翻译，作为写作的参考。十六世纪出版的一部最详细而有权威性的《伟大的中华帝国历史与现状》，为孟多萨（J.G.de Mendoza）所著，其中有两章专述中国的书籍和印刷术。这些书籍可能带回欧洲，至今还有一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修道院或图书馆中可以找到。

欧洲许多图书馆内的中文书籍都是在十七、十八或十九世纪初年便开始收藏。不仅历史悠久，保存了许多他处已经罕见的资料；同时由于资料来源，大都是私人所藏，原主为汉学家、宣教士或外交官，因此这些收藏都有其专业性和特色。现将比较罕见或国内已经失传而保存在国外的一些资料分别列举如下，以见其重要性之一斑：

（一）中国最早的写本、印本和拓本 这些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原始资料，现在都保存在欧洲各大图书馆之中。如存世

最早的写本敦煌卷子，其中约八千件在伦敦，四千件在巴黎，一万件在苏联。伦敦所藏本中有三百八十卷记有确切的年代，从公元四〇六年至九六年，其中五世纪者有六卷、六世纪者有四十四卷，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的写本书籍。至于印本，唐代的刊本国内已经无存，但至少有一二十件现存伦敦与巴黎，其中有九世纪的日历、单张的佛象和佛经，而举世闻名的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其二亲施舍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则保存在英国图书馆中。巴黎所藏唐印本有《一切如来尊胜佛顶陀罗尼》及其他早期印本。至于最早拓本存世的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塔铭》（六三二年）现存英伦，唐太宗书《温泉铭》（六五四年）及柳公权书《金刚经》（八二四年）现存巴黎。

五代吴越钱氏刊本《实篋印陀罗尼》现存有丙辰（九五六年）、乙串（九六五年）及乙亥（九七五年）三种。乙亥本流传最广，在国外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丙辰本则极罕见，一卷于一九五七年为瑞典国王购得，现藏其皇家图书馆中。中国最大的写本类书《永乐大典》二万卷，存世者仅约八百卷，其中不少存藏国外，如英国现存四十五册，法国四册，美国四十九册，德国及苏联所藏已在一九五一年归还中国。其他尚有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二册现存哈佛，乾隆朝《清实录》现存伦敦大学，满蒙文本则存剑桥。

（二）国内失传的孤本或罕本 这些古书主要是早期欧洲传教士或游历者从中国携归，或者是后来的汉学家、外交官或私人所藏捐入图书馆。年代久远，有些书他处或已无存，经过国内外专家偶尔发现其中很多为国内所未见的孤本。向达、王重民、方豪以及伯希和等，所作海外访书记均有详细报道。如西班牙Escorial城的圣劳伦图书馆存有明刊本的历史、针灸、小说和戏曲等书，其中有明杂剧三十种、曲谱二十种，据说戏曲中至少有九种为国内所失传。向达记牛津藏书中有

明清戏曲书数十种，其中不乏善本。又所藏福建民间歌谣中有关台湾者二十一种，皆道光初年刊本，极为稀见。最引人注意者为所藏台湾郑氏所刊《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两部（英国图书馆亦藏一部），内有‘招讨大将军印’。永历二十五年即康熙十四年（一六二二年），此时郑氏孤悬海外，奉明正朔，所用历书即与康熙《通书》推算不同。这一历书未见在国内收藏。其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三）有关中西交通的早期史料 这一类资料在国外收藏特别丰富，多系早期欧美来华人士的著述、通信及文件等第一手史料。因不在四部之内，为国内藏书家所不纳或未加重视。尤其洋人以中文所写的译著，为中国的士大夫所轻视。但是时过境迁，这些资料即使片言只字，都成为研究早期中西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如明清两代耶苏会入华宣教士的中文译著不下四百多种，很多存藏在外国。又如西班牙马德里图书馆中便有一些早期天主教教士的中文著作，其中有最早为伯希和所发现的一部《明心实鑑》（公元一五九六年刊本），为一位名郭波（Copo）者所译，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科学的书。另有一部《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公元一五九三年刊本），是一位西人执笔，比利玛窦等人的著作，要早十几年，仅比罗民圣的《天主实录》（一五八四年）稍迟。其他如保存在梵蒂冈和意、西、葡等处图书馆中的资料，也都是在国内不易多见。

另外在中国以外地区所印的一些中文书籍，如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马六甲、澳门等地早期宣教士的译著。上节所述两种中文著译便是在菲律宾所印，一些圣经、字典及早期的杂志则多在马六甲和澳门所印。至于保存在国外的外交文件，更是研究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如里斯本档案馆里存有一千二百种有关澳门的原始文献，其他各国档案馆也存有不少中文资料，可供研究当时的通

商、传教、禁烟以及和各国间的外交关系。

(四) 禁书 因为政治或社会上的种种原因,有好多书籍在刊行后列入禁书,不许流通或遭销毁。历代的文字狱使无数的书籍受到毁灭。但在国外没有国内政治上或其他禁忌,因此一些国内的禁书,得以在国外保存。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太平天国所印书,根据《旨准颁行诏书二十九种》及以后续刊十种,除了最近在国内发现少数几种外,全部或大部都是在国外的图书馆所保存。如英国图书馆就藏有三十种,纽约公共图书馆二十四种。现在辑印的太平天国文献大部都根据国外藏本所复制。

此外,色情小说内容淫秽,为维持风化,这一类黄色书籍多在禁止之列,但为一些国外的私人或图书馆所收藏。如荷兰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所藏明清小说一百十七种,其中一些是他写作《古代中国的性生活》所根据的主要资料。这一批书籍现归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已制成缩微胶片出售。其中一些明万历年雕版,高氏从日本购得原版片复印流传,如《花营锦阵》、《秘书十种》和《秘戏图考》,在国内久已失传,但在国外图书馆还有收藏。

(五) 书籍以外的实物和印刷品 一些和印刷术有关的罕见资料在国内或已无存,但偶尔可在国外的收藏中发现。譬如德国民俗博物馆所藏蒙古西征时代所传到欧洲の木刻所印纸牌,为现存最早的样本。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十八世纪清乾隆时代苏州桃花坞张星聚用西洋透视法所制作的版书,有西湖及苏州的风景和翻刻或模仿西洋作风的画片,部为他处所未见。日本青山新收其所编《支那古版画图录》(东京,一九三二年),有黑田源次序,殆为孤本。其他如《十竹斋书画谱》、《笈谱》和《芥子园画传》的初印本和早期印本,也可在欧美许多图书馆中找到。

至于现存的雕刻木版,明代以前者都已

无存,但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塞特藏(Spencer Collection)所存的一块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印板。这板残存正面长约四十三公分,高十三公分,刻有佛像经咒,反面刊一弥陀坐像,文字残缺,可识者有“掩口口林”,“敬施法印比丘尼”等字样。据称此板系河北鉅鹿出土,上有乙丑(一九二五年)秋冯汝玠题识,认为是北宋雕板,果如是,当系现存的一件作印刷用的最早雕板实物。

时代销后的雕板实物和雕印工具,为刻字刀、凿、拍子、刷子、把子等,在国外图书馆或博物馆也间有收藏,作为中国传统印刷术的示范。巴黎国立图书馆所收藏敦煌所获元代提吾儿的木活字、芝加哥自然科学博物馆所藏的雕刻工具、年画、刺孔复印的纸模、威斯康辛苹果城纸博物馆所藏本刻套印的木板等等,虽非孤罕,也是国内所未为人注意而作有系统收集的实物,可供研究中国传统印刷术的参考。

三、欧洲各国的中文藏书

总的说来,欧洲各国收藏中文的图书馆,大小至少有五十所以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二所较有规模或特色的汉学研究中心和图书馆,估计收藏在十万册左右的有十所一万册以上十万册以下的有三十所,其余是一些数量比少的专门图书馆或特藏。如和美国比较,欧洲中文图书馆的历史较为悠久,收藏的罕见资料为美国所不及,但在收藏的数量和服务方面都远不及美国的馆数之多、藏书之富、经费及人力的充足、以及检索和使用的方便。现将欧洲各国的中文藏书,简介如下:

西欧各国较有规模的中文藏书,主要在英、法、德三国,每一国家至少有十所以上的国家图书馆和大学或研究图书馆。

1. 英国图书馆继承大英博物院东方写本与刊本部的中文藏书约七万册,但拥有世

世界上最早的中文写本、印本和拓本,保存最完整的敦煌卷子 and 收藏很多的《永乐大典》,这些都是稀世之珍,没有他馆可以相较。至于几所著名大学的藏书,大部分的来源是私人收藏。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是英国最早设有汉学讲座的一所大学,所藏中文书籍约十三万七千多册,古书主要来自莫里逊(Robert Morrison)、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等人的私藏和大学院以及英皇学院旧藏的移存。善本有明版一百多种,《永乐大典》三册,抄本《清高宗实录》,特藏有各省拳乱奏摺、通商及外交文件、海关档案,及方志一千一百三十九种。

牛津大学的中文书最早于一六〇四年就开始入藏,全部是私人所赠送。稍后的收藏主要来自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一八八一年所赠约二万册及巴克豪氏(Edmund Backhouse)于二十世纪初年所赠约三万册,成为牛津所藏中文古书的基础。其中四部书约占四万册,经史俱备,子集稍差。另有明版约二百部、旧抄本三五七部、《永乐大典》十九册、太平天国印书十九种五十册、丛书三十多种、方志一千六百七十种、基督教义书约二千册,以及十八及十九世纪有关商业往来的资料,极为罕见。现在收藏已达十万册,另东方学院收藏有关美术及考古书籍约一万五千册。

剑桥大学的中文藏书是以该校汉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在一八八六年所赠私人藏书为其基础,其后由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编成书目。该馆所藏约一万五千册,内容罕见抄本八十多部、《永乐大典》二部、明钟惺《古诗归》一部、蒙汉合璧《清实录》,及方志三百种。该馆图书按其主题分别入藏各系,普通参考书及考古美术资料则藏在“东方学院”,合计中文收藏约六万五千册。

剑桥另有一独立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现属李约瑟(Joseph Needham)研究所,

收藏李氏历年来搜集有关中国科技史的古籍及各国文字所写的论文、小册子等资料约两万册。善本中有金泰和四年(一二〇四年)刊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三十卷,明弘治、嘉靖间山西平阳刊本《新刊铜人针灸经》七卷,及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无锡华理覆宋刊本《橘录》三卷。该馆所藏资料曾选出有关营养、针灸、中药、农业及木工、水利五组共二十五种,制有缩微胶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

此外尚有爱丁堡大学、杜汉大学、李兹大学亦收藏中文图书,但都是战后新设,藏书以现代资料为主。其他如皇家亚洲学会藏有方志、明清小说、满、蒙、藏文字典及其他中文书籍。大卫中国艺术基金合藏有中国美术、考古书籍五千册,书画及瓷器尤多精品。另有一些学会亦略有收藏。

2. 法国是西方正统“汉学”研究的第一个国家。从十六世纪开始便有耶稣会士从中国带回的书籍。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有一福建黄姓青年(Arcade Haong)来到法国皇家图书馆整理积存的中文典籍。这些资料成为法国汉学研究较之其他国家更有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黄君不幸在法夭折,其后续有杨德望、高类思二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到达法国进入耶稣会,曾作有关中国政府制度的研究,成为亚当·斯密《富国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间接取材的根据。

现在法国的中文重要收藏是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东方组(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ivision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一九〇八年伯希和自中国携回中文书八千万册及敦煌卷子三千七百卷,成为该馆收藏的重心。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的中文收藏达四十万册,数量为全欧之冠。其中有丛书二千五百种,原版方志一千余种。一九五九年又接收自北京运回至中

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原有藏书,收存更富。

东方语文学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于一八四三年设立中文讲座组,图书馆于一八七四年成立,现藏书约三万册。在巴黎以外最主要的中文图书馆为里昂大学中文系中法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e Jean Monlin Lyon III, Bibliotheque Sinologue de l'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 藏书约一万册。其他尚有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文系图书馆 (Universite Paris 7 Bibliotheque de l'UER Asie Orientale)、贵美博物馆 (Musee Guimet) 等机构亦多少藏有中文图书,供教学或研究之用。

3. 德国的汉学研究发展较其他国家为迟,因为早期欧洲对中国有研究的耶稣会士都是来自法、意、西、葡等国。其后虽有一些德国籍的教士来华,如汤若望 (Jean Adam von Schall) 派在钦天监办事,对于其本国的汉学并无贡献。那时德国没有汉学研究的设施,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员必需到法国接受训练,而一些研究汉学的学者也少有就业的机会。如著名的汉学家克拉普洛特 (Heinrich J. Klaproth) 一八〇四年任教于帝俄,一八一五年定居巴黎。一八二二年在法国编纂柏林皇家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目,一八四〇年由萧特 (William Schott) 续编,可知当时的中文藏书已渐受重视。此外,慕尼黑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主要是由一位在法国造就的汉学家牛曼 (Karl F. Neumann) 于一八二九年在中国购得图书六千卷,一八三一年回国后赠予慕尼黑图书馆三千五百卷,其余归柏林图书馆收藏。

德国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才正式设立汉学讲座,但很多德国著名汉学家多未能在本国发挥其所长。如翻译《诸蕃志》的夏德 (Friedrich Hirth) 与洛克希尔 (W. W. Rockhill) 以及精通十几种东方语文而著作等身的劳福 (Berthold Laufer) 多在美国从

事教学与研究,对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战争摧毁了德国许多重要的图书馆。一九四五年后由于政治分裂,柏林国立普鲁士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分散在各地,战后唯一未遭破坏的学术机构是汉堡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同时在柏林、莱比锡,随后在慕尼黑、科隆、波昂、符兹堡、厄尔朗根、海德堡、明斯特、洪堡以及博洪的鲁尔等大学都设有中文讲座,因此图书馆设备也随之建立。现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设在西柏林,中文藏书十一万册,巴伐利亚邦立图书馆十三万册,汉堡大学七万多册,科隆大学三万五千册,波昂大学五万册,还有原在北京现迁移圣奥格斯丁城的华裔学杂志社 (Monumenta Serica) 藏书约六万册。其他各大学的中文藏书多系战后成立,数量不大。

4. 西欧其他国家的中文收藏。除了上述英、法、德三国的中文图书外,西欧主要的中文藏书当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 (Sinologisch Instituut,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图书馆。该校的汉学讲座成立于一八七五年,中文藏书在一八八三年仅二百多种,一九三〇年尚不足千册,最近馆藏已增至十六万册以上,其中有高罗佩 (Robert. H. Van Gulik) 藏书二千五百种约一万册;内明版约五十种,明清小说一百十七种及有关书画、古琴等书,颇多稀见之本。

意大利的中文藏书为数不多,主要在罗马国家中央图书馆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额我略大学 (Pontificia Universita Gregoriana)、拿颇里的东方大学亚洲学院 (Oriental University, Seminar of Asian studies)、威尼斯的东方学院 (Oriental Institut at Venice) 与威尼斯大学中文系 (University of Venice, Chinese Department), 但收藏不多。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明清旧籍四百多种,一九二二年由伯希和编成目录一册,未出版。

比利时的中文藏书主要是在比利时汉学研究所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藏书约四万册; 鲁汶大学东方语文研究所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藏书二万册; 以及比京博物馆 (Muse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等。

5. 北欧的中文藏书也极负盛名, 其中尤以瑞典皇家图书馆 (Swedish Royal Library) 为最, 存有一八七九年入藏的劳登施高特藏 (Nordenskiöld collection) 约五千册, 马丁特藏 (Gunner Martin's Collection) 有关艺术图书数百种, 以及五代显德三年 (一九五六年) 印本陀罗尼经卷。该馆现与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以及远东古物博物馆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四个单位所藏约七万五千册, 合并成为戈斯德六世远东研究图书馆 King Gustav VI Adolfs Library for Far Eastern Research) 统一管理, 避免重复, 这是最近欧洲各小国专业图书馆的一种新趋势。

挪威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是奥斯陆的皇家图书馆 (Royal Library), 收藏满、蒙、藏文书甚丰, 奥斯陆大学东亚研究所 (University of Oslo East Asian Institute) 亦有中文藏书。丹麦的主要中文藏书在皇家图书馆、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East Asian Institute) 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亚洲研究院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这三馆现均位于一处。

6. 东欧各国的收藏中文古籍情形不很清楚, 有关报道甚少。大概在捷克、匈牙利、东德等国都有相当规模的中文藏书。如捷克布拉格 (Prague) 东方学院所属鲁迅图书馆在一九五〇年底设立, 据一九七〇年调查, 藏书六万二千多册, 最近的收藏必有增加。匈牙利的中文藏书主要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

图书馆, 藏书有蒙、藏文资料和斯坦因 (Aurel Stein) 所遗存的图书。其他如东亚艺术博物院 (Hopp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s) 和布达佩斯大学 (Eötvös Lorand University, Budapest) 中文系图书馆亦有收藏, 但大部为新书。

7. 苏联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汉学”, 向来是东方学的一个部门。最早帝俄时代的汉学家也是东正教的传教士, 在北京设有俄罗斯馆, 学习汉文和满文, 学生成为俄国早期的汉学家。道光二十四年 (一八二四年) 理藩院曾颁赏俄国在京学生达拉玛、修正笏、西夏文干珠尔及丹珠尔经各一部, 《朔方备乘》谓系雍和宫所存大藏经八千册, 俄国送还的书名在书中并有详细记载, 因为彼得大帝的提倡, 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就较他国为积极。

苏联现在主要的中文藏书在国家科学院汉字图书馆 (Sinological Library, Academy of Science of USSR)、列宁图书馆 (State V.I. Lenin Library of the USSR) 中文部, 莫斯科大学图书馆 (Moscow M.V. Lomonov State University), 国家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研究图书馆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Leningrad Branch) 亚洲人民学院图书馆 (Institute of Peoples University of Asia), 海参崴远东大学图书馆 (Far Eastern State University, Vladivostok), 及中亚细亚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其中亚洲人民学院图书馆藏有敦煌卷子一万卷, 已刊目录二九五三件。

四、北美中文图书馆近况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从十九世纪末叶才开始, 大部由赠送或交换而来。在二十世纪初, 美国主要的中文书藏约有十所, 即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康

乃尔大学、哈特佛神学院(Hartford Crerar)和纽布莱(Newberry)图书馆,总计藏书约二十万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一九二〇到一九四〇年代,由于学术团体的提倡,基金会和私人的支援,使中文图书资源得以迅速地增加。这一时期设立的新馆有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此外,夏威夷、宾州和西北等大学以及加州克里蒙学院(Claremont colleges)也都相继收集中文图书。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中文图书馆已增至二十所,藏书约一百万册,平均每年增加新书一万三千册,大部在二次大战之前所收集,因此奠定战后发展的基础。

战后扩展迅速,不仅新馆和藏书数量激增,而采访方针和性质也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对中国研究的趋向注重现代和当代,同时古籍的来源断绝,一般图书馆都采购近代出版的书刊。战后新设各馆主要有两部的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和中西部的米西根大学。此外,至少有三十多所州立或私立大学成立新馆,如东部的布朗、达特茅斯、马利兰、麻州、北加路林那、奥伯令、匹兹堡、罗彻斯特、路特格斯·圣约翰和西东等大学;中西部的伊利诺、印第安那、爱奥华、堪色斯、米西根州立大学(东兰辛)、米尼所达、私立华盛顿和威司康辛等大学;西部的亚尼桑那和奥利根等大学;南部的末米和德州大学;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多伦多大学,现将收藏中国古籍较多的几所主要图书馆简介于后。

(一)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北美中文书籍入藏最早也是西方收藏中文图书最富的一所图书馆。最初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清廷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中文古籍十种约一千册,在该馆存置迄今已逾一百年。这批书不仅是美国东方文库之祖,也是中美两国间图书交换的开始。其后美华驻

华公使及中国政府陆续赠书,美国农业部亦为该馆采购有关中国农业、丛书、类书、地图和方志等书约二万多册,使该馆的中文藏书日渐充实。

一九二七年,该馆成立东方部,由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持,与北平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先后出版了该馆所藏《善本书录》及《方志目录》,又编印了《清代名人传》等书,俨然成为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心。

该馆所藏中文书籍迄今已达五十万卷,其中宋、元、明刊本一千五百余种,约二万五千册,抄本及稿本约二百种,方志三千七百五十种,约六万册,家谱三百种,约五千册,别集四千七百种,丛书三千种。另该馆法学图书馆藏有中国历代法制图书约三万册。此外,国立农业图书馆有中文图书约二万册,国立医学图书馆约一万册。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自一八七九年起设立中文讲座,对中文图书略有收藏,迄至一九二七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时约七千册。此后积极搜罗,尤其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私人珍藏陆续流出,因此所获甚多精本。目前该馆所藏中文图书将近四十万册。其中宋、元、明刊本约一千四百种,二万余册,清初至乾隆朝刊本二千种、共约二万余册。另抄、稿本一千二百十五种,四千五百余册,拓片五百余件,法帖三十六种,三百零一册。又原版方志三千五百二十五种,约三万五千册,丛书一千四百种,约六万册。

该馆所藏明板、套板、画谱等,选择亦颇完备。如明代朱墨套印本有五十五种,《十竹斋书画谱》有初印及后印本六种,《芥子园画传》初集原刊本三部、全套后印本六种。又明刊类书达一百十七种,其中四库著录及存目所收有五十一,四库失败者有四十六种。二次大战后该馆又陆续搜购有关中国文学、戏曲、小说、佛学以及许多稿本、浅卷、

唱本及商店帐簿等类资料，尤以齐氏百舍斋所藏明清戏曲小说七十二种为最名贵，内多当时禁书。该馆现正印制藏书的书本目录。

(三) 耶鲁大学：中文藏书始自一八七八年，由容闳赠书四十种，计一千二百八十册，又《图书集成》一部，五千零四十册。次年增设中文讲座。其后藏书陆续增加，现在中文部份已达二十五万册，其中宋本三种十四册、明刊本五十九种、抄本三种，共八百三十五册，内有通俗小说二十种、图谱五种、方志两种、及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抄本《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六册。近年简又文将旧藏有关太平天国书籍三百二十种共六百四十册及其他资料捐赠该馆。

(四) 哥伦比亚大学：一九〇四年设置于良（Dean Lung）中文讲座，次年成立中文图书馆，由清政府赠送《图书集成》一部。此后逐年扩充，现中文藏书已增至二十余万册，其中有宋、元、明刊本二百种，约四千册，另三十三种、年代未定，抄、稿本四十三种，一百二十六册，拓片二百五十八件。所藏明弘治十年（一四九七年）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诗经》二十卷，九行十七字，为他处所未见，似为孤本。其他有原本方志一千六百余种，约一万七千册，原本族谱一千零四十一种，约一万册，为中国以外所存族谱最为完备之特藏。此外，所藏明清各部则例、明人文集等资料亦甚丰富。

(五) 康乃尔大学：华生文库是一九一八年该校校友华生（Charles W. Wason）捐资设立，主要为有关中国研究的西文书刊，但其中有《永乐大典》六册，为美国除国会以外收藏最多之一馆。该馆中文藏书约二十三万册，多为有关现代中国研究资料，但所藏俗文学及戏曲书籍为数不少。另有北京伦敦及巴黎所存全部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为该馆特藏。

(六) 普林斯敦大学：一九三七年购入原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葛思德（Guion

W. Gest）藏书约十万册，其中有宋、元刊本七种，二千八百余册，明刊本一千余种，二万四千册。内藏沙藏一部，医书五百种，一千七百册，最为名贵。其后该馆陆续扩充，现中文藏书约二十五万册。又存有敦煌卷子三卷及绸袍一体，内录八股文七百篇，达五十万言，为科举考试之夹带。（按芝加哥自然科学博物馆亦存有一件）。

(七) 芝加哥大学：一九三六年开始中文教学，同时成立远东图书馆，时值中日战争前夕，私人藏书大量流出，得以有系统地选择搜购。一九四三年又购入劳福（Berthold Laufer）于清末在华为纽布莱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所收集之中、日、满、蒙、藏文书籍二万一千余册。作者于一九四七年应聘来芝主持该馆，其时藏书已近十万册，大部为古籍。一九五八年起积极扩充，迄今馆藏已逾四十余万册，中文将近三十万册。其中以经部一千七百余种最为完备，为西方各馆收藏之冠。另有方志二千七百余种，大部皆为原川、龙川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为最富，丛书亦有六百多种。

善本有元刊本二种，明刊本三百三十一一种，二千二百三十册，又正统人藏经万历增刻本全套，计七千九百二十册，汉封泥十一件，敦煌卷子《妙法莲华经》三卷，五代《宝篋印陀罗经》一卷，翰林院旧藏《杭双溪（淮）先生诗集》八卷，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刊本，后有朱彝尊朱笔题跋与四库著录全同，所据当系此本。其他明刊罕本颇多，举《尚书》为例，其中所藏有王肯堂《尚书要旨》三十六卷。孙继有《尚书集解》十卷，国子监校刊《尚书注疏》十集，潘士遴《尚书笈签》二十一卷，王樵《书帷别记》四卷，刘三吾《书博会通》六卷，及申时行《书经讲义会编》十二卷，均极稀见。

(八) 米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为美国

中西部另一收藏中文书籍丰富的图书馆。该馆原藏日文较多，但自一九四八年起大加扩充，中文藏书激增，现已达二十万册。其中虽原本古籍不多，但复印本及缩微本为数不少，足供研究之用。

(九) 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 东亚图书馆：为美国西部创设最早而现藏古籍最富的一所。一八九六年该校设立中文讲座，由英人傅兰雅 (John Fryer) 任教，携回傅氏在江南制造局任职时所译中文科技书全套约一百种，为现在所知收藏最完备的一套。其后由江亢虎氏继任，江氏将其私人藏书一万三千册捐赠该馆，为其中文藏书奠定基础。近来该馆购入贺光中藏书，其中以佛经为多。现该馆中文藏书约二十五万册。另加州大学各地区分校亦收藏中文书籍，如洛杉矶校区东方图书馆，于一九四八年设立，现藏约十万册。圣巴巴拉校区图书馆东方部藏书藏约十万册。圣巴巴拉校区图书馆东方部藏书约三万五千册。其他如戴维斯、圣的哥校区亦有相当收藏。

(十) 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现藏中文图书将近二十万册，但以现代及当代资料为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原藏中文书，现亦并入该馆，故所藏亦有旧籍。

(十一) 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一九四八年设立，为美国西部重要收藏之一。中文图书现存约十六万册。古籍中有明刊本若干种，编有选目一册。又洛克 (Joseph Rock) 所收集的方志八百三十三种现归该馆，内四川一百四十三种，云南一百四十八种，台湾八十种，最为完备。另广东珠江三角洲资料亦有三百余种，木鱼书三百七十三册，亦为该馆特藏。

(十二) 监湖城的族谱学会：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成为西方收藏中国族谱和地方志最完备的一个机构。该会于一九一八年入藏第一部中国族谱即《兴宁刁氏族谱》并自一九六〇年开始用缩微胶卷大规模的摄制

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欧洲和美国多处所藏的中国族谱、方志、登科录、录及其他有关家族研究的资料。主片储藏在美国监湖城花冈岩山的隧道库中。迄至一九八〇年，该会收藏中国族谱二千五百九十四种，地方志五千一百二十种代表二千零三十八个地区，约合原本十万册以上。现该会在台湾为二百五十多个地区的每一家族摄制私藏族谱，已完成者达一万四千种，尤以闽南语系及客家的族谱为最多。

(十三) 加拿大的中文藏书：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多伦多大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为主要。皇家博物馆于一九二九年收购慕学勋私人藏书约四万册，其中有宋、元、明刊本约三百种，抄本稿本七十种，共四千一百八十二册，甚多精品。如稿本《宋明兵志备览》、抄本《三朝要典》为清禁书，明永乐刊本御纂《神僧传》，亦极罕见。后又增购一万册于一九三五年一并运回，连同该馆所藏甲骨、金石文学及古物，成为当时加拿大的汉学研究中心。一九五三年该馆除保留拓片五千种及一部分有关艺术及考古的书籍外，其他全部移交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该校在一九五〇年代扩充中文教学及图书设备，现藏中文书籍约八万册，内方志约一千二百种。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成立于一九六〇年，购入澳门姚钧石蒲坂藏书四万五千册，其中有宋、元、明刊本三百余种，三千多册；抄本二十三种、五百六十余种；及广东方志八十六种，最为名贵。如陈澧手稿本《说文声统》、明成化刊本《张曲汇集》收入四部丛刊，宋刊本《储光义诗集》等，均极罕见。该馆现藏中文书约十五万册，为加拿大收藏古籍最富的一所图书馆。此外尚有十余所大学略有中文书籍，均系新置，所藏不多。

(十四) 其他还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及私人亦收藏中国古籍，其中不乏善本与特藏。如波士顿美术馆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均藏有五代印本文殊菩萨及观世音佛像，克里扶阏、印地安堡力斯、堪色斯及华盛顿佛里尔等美术馆均藏有宋、元、明刊本、十竹斋及芥子园画谱早期刊本及拓片，作为美术品样本。其他收藏拓片者亦不少，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有五千件，多河南省碑铭，柏克莱加州大学藏有二千余件；芝加哥斐尔德自然科学博物馆所藏二千零十四件碑拓编有目录《拓本聚瑛》一册，附图一百三十五幅及件名、人名、寺宙、地区及主题五种索引，极便检索。

此外私人藏书家亦颇多精品，如纽约Donald J. Wineman藏有金刻赵城藏，加州Gerd Wallenstein藏有康熙内府原刻本《御制耕织图》、洛杉矶J. S. Edgren藏有清萧云从所刻《太平山水园画》、新泽西州王方宇藏有明杨尔会《图绘宗彝》及沈遴奇《剪霞集》彩色套印本。又纽约翁万戈所存其先人翁方纲旧藏善本最多，如宋刻本《长短经》、《会昌一品制集》、《鉴诫录》、《邵子观物内外编》、《丁卯集》及《施颀注苏东坡诗》等均极罕见。以上所列各种最近在纽约展出，书影收入《美国所藏中国善本目录》(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由华美协进社出版。

五、结 论

中国古籍不仅是自己国家的瑰宝，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不管存藏在国内或国外，我们都有责任

使其收藏安全，保存久远，不致因天灾、人祸、环境或其本身的衰老而毁灭。实际说来，所有的书籍都应该维护，新书用纸含酸量高，生命更是短促，怎样能保存长远，也是当今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古籍和其他古物一样，年代久远，流传日稀，本身更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

中国是印刷术诞生的圣地，也是历史上书籍和文献累积最丰富的国家。但是中国早期的典籍和印本，迄今还没有一项全面而有系统的著录，可供查考。尤其现知最早的写本、印本和拓本都存藏在国外，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也常在国外的公私收藏中发现，因此编制国外收藏中国古籍的联合目录，实属要图。这不仅可作为中国文化财宝的一份清册，补充国内收藏和著录的缺失，更可提供情报，作为学者研究各方面专题时的指南。

联合目录的编制，应包括“善本”和“特藏”两大类。前者是指早期的写本、印本和其他在目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版本；后者是指某一种类对学术研究特别重要的资料，如方志、族谱、丛书、类书、传记、文集，以至小说、戏曲等等专题，收藏丰富，足够参考。国内所藏的善本和方志，已经编印或正在编印综合式的目录或索引，但如不包括国外的收藏，就不能代表中国现存文化财产的全部面貌。因此当务之急就应详细调查，这些存藏在国外的珍本和秘籍，尤其在日和欧、美地区所藏特别丰富，自应优先处理，但国外这种专才缺乏，有待国内的合作，才能成功。

The New Building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cluding the interior furnishing, could be rated as world's first class. Its collection also goes among the best. A modernized library needs modernized equipments, but it takes men to bring modernized equipments into full play. Therefore, the point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men's conceptions. True modernization is not what money can buy.

No culture could ever be developed should it be cut off from its history, or be isolated from outside world. The path we took in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testified to the truth of such understand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we are more resolute and more capable than ever in assimilating the essence of culture from other nations to enrich the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s ready, in co-operation with cultural workers of the country,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page 8)

"Improve and Enhance Library Service"

The Notice issued jointly by the four leading bodies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7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ur country has placed in strategic priority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as stressed the exploitation of intellectual resources,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being strengthened. These factors no doubt have to ask for newer and higher library service whose present status is, however, far from fulfilling such needs in the sense of the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and an overall plan and the lack of a system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document resources which have in turn caused both the duplication and the missing of documents and have harmed the resource sharing. The present work in libraries sees no vitality, the number of network or service station is small and the level of service is low.

In view of such state of affairs, the Notice pointed out the need for reform in library work, and made decision for these four leading bodies to carry on studies on the necessary guiding principle, policies, legal regulations and long-term planning; and to organize appropriate coordination both in a nationwide acquisi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n a nationwid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in China. (page 23)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Old and Rare Books Kept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S.A.

Books in Chinese were kept in many a European library beginning the 17th, 18th or early 19th century. These long time kept books are rarely seen elsewhere, and, as a large part was collected either by Sinologists, missionaries, or by diplomats, they were noted by concentrated subjects and other special features. This

(to continue on page 84)

神田博士数次来信，尤为关心，潘贤模先生自美国寄来清腊板《辕门钞》照片一张，美籍钱存训博士寄来复制资料并赐序文。瑞典原皇家图书馆研究东亚印刷史的艾思仁 J. S. Edgsen 先生，自1974年来即蒙其寄赠大作。去年九、十月自美国数次来信，欲来华与鄙人会见，并商谈翻译拙稿成英文本。今年二月，他到杭州要求相见，惜春节前，余已由杭返嵊，未能会晤为憾，以上各位先生，对拙作的关怀与帮助，十分感激，特籍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1984年端午节于嵊县廿八都老家，时年七十七岁。

拙稿五十四万字，于85年5月、8月分两次交

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已见《上海新书目》新书预告。

《上海新书目》114期新书预告称：

“本书是作者半个多世纪来长期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丰硕成果……全书内容丰富，有不少罕见的资料和精辟的见解。本书的出版，学术界期待已久，可以说是一本中外瞩目的空前巨著……”。

关于铸铜模新学报上偶有试铸报导，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会也曾在北京成立，惟未见行动，此自序与原序微有改易字句。此外作序者又有国际著名纸与印刷史专家美国钱存训博士与李希泌先生二人。

1987年7月19日张秀民又识于瞻山

(上接第6页)

(continued from page 6)

article assembles data of important and valuable materials so far rarely seen or existed only on foreign lands.

The author here gives a brilliant exposition of these foreign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meanwhi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China is the Mecca for printing and possesses the most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documents in history. But there is regrettably not yet in existence an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atalogue of such early classics and printed books of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the earliest known hand-copied books, printed books and books of rubbings are all kept in foreign lands. A great number of materials good for research purpose were discovered in foreign public or private collections. Therefore it is indispensable to compile a union catalogue of old rare Chinese books kept either in or outside China. (Page 57)

Author's Preface to "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half a century's hard work by the author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ook is imbued with rare data and penetrating analysis. (Page 80)